

特別報導 · 仁傑

慈濟人的長情大愛

婦女社會力的萌芽

慈濟功德會提供了婦女們一個新的著力點
讓這群原本的弱勢者走出家庭
藉由參與社會服務，找到了自己身分的認同……

撰文／丁仁傑

圖片提供／慈濟文史部

攝影／王永泰

我體悟到在性命終結時，財產、名譽、地位毫無作用可言，死神的權力是那麼大。我思索人生在世所為何來？若只是為了溫飽三餐而終日忙碌，又有何意義？女人的一生只在擔負一個家庭嗎？何不將這份心力，將父母的養育之恩，擴大報答給芸芸眾生呢？

——證嚴法師著《證嚴法師心蓮》

921大地震中，我們看到了
許多民間社團以最快的
速度投入災區，與民衆一起
面對災難，撫平傷痛。這
其中我們尤其看到了許多
穿著「藍天白雲」制服的



慈濟功德會志工，總是迅速的抵達受災地點，輸送民衆所需的物資，準備民衆所需的飲食。而在災後重建的階段，慈濟志工更是大量出動，協力動手為災民搭蓋簡易屋——

「民衆在哪裡有需要，就有慈濟志工穿梭在他們的周邊，我們突然發現台灣有這樣一群無怨無尤的志工，一直在為台灣社會默默的付出。為什麼這些人救人與援助的速度那麼快？為什麼他們能夠擺下個人的私事而以救助他人為職志呢？」

戰後一代婦女找尋自我意義

慈濟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它已成立了三十多個年頭，不但主持人是一個纖瘦體弱的比丘尼，成員更多的是家庭主婦。在證嚴法師的領導下，它一開始是由四位比丘尼和三十位家庭主婦所組成的，強調及時

度那樣快？為什麼他們能夠擺下個人的私事而以救助他人為職志呢？

慈濟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它已成立了三十多個年頭，不但主持人是一個纖瘦體弱的比丘尼，成員更多的是家庭主婦。在證嚴法師的領導下，它一開始是由四位比丘尼和三十位家庭主婦所組成的，強調及時

「慈誠隊員」則是由男性所組成的周邊組織，多半也是「委員」們的另一半。透過婦女平常活絡的網絡，慈濟把分布在台灣各行各業和社會角落中的資源聚合了起來，有效率的導往行善救助的方向。

三十多年來的慈濟成長之路，

與當代台灣婦女社會力的萌芽和發展密不可分。在過去，婦女的社會地位一直是依附性的，她們無法自由的選擇自己的角色，只能安分的做一個家庭主婦。

一位近五十歲的慈濟委員告訴我：「我和先生是戀愛結婚的，結婚前我有上學讀書，結婚後先生跟我提出兩個條件：一是和公婆一起住；一是不能到外面去上班。因為他爸爸不喜歡媳婦拋頭露面去外面上班，所以結婚之後，我必須要受這麼多約束。」這裡面顯現出傳統



(右) 慈濟教師聯誼會，通常利用暑假做居家關懷的服務，照顧獨居的老人。

(左) 每年春節前，各方有許多美容師自動組織起來，為慈濟照顧戶提供免費義燙。



事實上，台灣戰後一代出生的婦女，在婚姻生活上難以掙脫的束縛。

事實上，台灣戰後一代出生的婦女，不論在教育程度和生活領域上都已經有了很大的擴展，人生的

價值觀也起了相應的改變。同時隨著節育後子女數的減少，家務工作自動化等等，這些婦女也開始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認真思考什麼樣的生活才是有意義的。但是和此相對的，沿襲自傳統父權社會中對於婦女的角色期待（主要來自於婦女的公婆和先生），卻完全跟不上這一代婦女的能力與心靈成長。

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婦女們並不想脫離自己的家庭。對於今天四五十歲以上，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婦女而言，她們對家庭的態度是矛盾的——她們雖然在家庭生活上得不到適當的回饋，卻還是習慣遵守傳統定義下女性角色中的內容：母性的、溫柔的、慈悲的、富有人愛心的等社會上對於所謂的「女人」的期望。

更進一步來說，她們所擁有的社會資源，也並不能夠真正讓自己獨立於家庭之外而存在，這使得其對於傳統的家庭倫理價值，像是孝順、和諧等等，還是有著刻意維護的心理；加上在快速工業化、商業

化與都市化的社會變遷中，浮華的社會風氣、層出不窮的青少年問題，這些也使她們開始萌發要保護這個過去並不能由其中獲得太多滿足感的家園。

一個機會：同時穩踏公私領域

在這種背景之下，我們就更容易了解，為什麼慈濟初期的社會動員是如此的成功——在證嚴法師所提供的社會行動模式裡，這些參與的婦女既可以延續傳統的婦女角色，又可以有與外界社會做有意義接觸的機會。如同慈濟中的委員們常轉述證嚴法師的話：「妳的右腳是妳的家庭，妳的左腳是妳的慈濟，兩腳這樣一起站起來不是很穩嗎？」

以婦女的生活網絡來擴展關懷

社會的觸角，並不會直接挑戰公領域（通常指男人們政治與經濟活動的場域）中的正當性與支配性，這也是傳統父權社會和過去威權體制中比較可能接受和容忍的社會行動方式；而婦女們為家庭「做功



德」，為社會變遷中被人忽視的貧病弱勢者提供必須的服務，也達成了重要的家庭與社會功能，正因為如此，女性也在這個過程裡，得到

了某種來自社會的尊重與承認。

換言之，慈濟功德會提供了婦女一個注意力轉移的焦點和新生活型態的著力點，一方面迴避了女性走入公領域時會遇到的阻力（也就是要求婦女繼續對公婆和先生保持忍讓）；一方面則以符應於傳統女性角色的行動方式帶領婦女走出家庭。在慈濟漫長的集體動員背後，是充滿了無限的悲情和妥協性的，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台灣某個世代的婦女們，能夠在這種過程中尋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角色。

原本的弱勢，卻展現大力量

如此大規模數目的婦女，開始走出家庭並參與社會服務，這在台灣歷史上是一個非常革命性的進展。這些婦女原本是社會上的弱勢，無法參與主流價值的建構，也沒有機會相互溝通分享彼此的情感，而今卻能在慈濟的園地裡找到自己身分的認同，更能實質表達對社會的關懷。

「如何能做得符合自己的理想，很不簡單！但是，不論未來如何，我們要如在黑豆中挑紅豆——不要管黑豆有多少，只要用心去挑紅豆就好了。我們但求盡心盡力，化雜為簡，守在自己的崗位，發揮自己的良能。：很多事情說不定是在癡人說夢，但也常常美夢成真。」（出於《慈濟月刊》365頁）

證嚴法師講：「做，就對了！」這種行動方式看起來消極，卻也是證嚴法師與婦女們共同長期摸索出來，對於她們最具有實踐上的潛在開展性的行為模式。這些婦女並非從改造政策或是社會結構的方向來著手，也不從佛理的宣揚來著手，而只由單純行動的本身來著力，這正是在台灣特殊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中，她們唯一可以著力，並且也唯一可以由此獲得到社會的承認與尊重的方式。

而這些婦女們在參與慈濟中，有了許多以前所從來不會有過的生活體驗，一方面親身看到了在這個社會裡許多無人注意的受苦難的貧

(右) 前往醫院，撫慰因公共意外災害而受傷的民眾。

(左上) 由大專青年組成的慈濟青年聯誼會，在年終舉辦義賣園遊會，所得捐出作為大林醫院建造基金。

(左下) 慈濟早療團隊，為發展遲緩兒童提供早期療育的服務。



家庭與社會的學習與成長之路。而慈濟三十多年來的發展與茁壯，與這一個世代台灣中年婦女社會力的萌芽和發展，是有著同步並行的關係的。然而這還只是故事中的一半，故事中的另一半發生在台灣原來比較傳統的男性身上。

當初的「反對黨」也被打動

在這一次921震災中，除了女性

慈濟委員們忙著準備食物、安撫災民以外，也有許多動作敏捷的男志工們，翻山越嶺，強度溪流，以最快的速度送達所需的物資，幫忙搬運傷患。他們可能是大老闆、上班族、計程車司機、泥水匠師父、或路邊的攤販，一接到通知，馬上換上制服，準備好資源和相關工具，前往支援慈濟各種救助活動。

男性加入慈濟，主要起源於一九八九年慈濟成立了以男性為組成分子的志工團體「慈誠隊」，之後有愈來愈多的男性開始加入了這個大家庭之中，而這些在社會上有經濟與財產獨立支配權的男性加入，慈濟開始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加

病者，其困苦與無奈甚至於超過自己家庭中情感上的困頓；一方面在許多急難救助裡，更眼見了人世的無常，對個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有了新的看法。

「在慈濟的世界裏，藉著很多的活動，讓我們很直接地體悟到人生的種種。例如貧戶訪察時，我們可以看到無可依恃，三餐不濟的孤苦老人。也有因一場車禍，而使正

悟》176頁)

慈濟提供了這些婦女一條連接



在慈濟醫院的兒童復健發展中心，志工定期前往陪伴孩童及家長做親子遊戲等活動。

進入「慈誠隊」的男性們必須遵守「慈濟十戒」——包括不邪淫、不抽煙、不喝酒、不嚼檳榔、甚至還有不參與政治。他們為什麼願意參與一個由女性們所主導的慈善團體？而又為什麼甘心樂意為女性們所定出來的戒律所約束呢？

事實上，這些慈誠隊員多半原來就是慈濟委員們的另一半。這些先生們雖然原來對於太太的參與慈濟都是反對黨，然而太太們的柔軟忍讓，默默承擔，卻也終於打動了

他們的心。尤其當他們看到慈濟提倡的柔和忍讓、減低物質上的欲望，自己做起、知足感恩……，這些看起來是那麼的柔弱，但實際發揮起來的力量卻又是那麼的堅強而持久；又親眼看到自己辛勤打拼的家園一步一步的腐蝕與毀壞，而證嚴法師和其所領導的一群婦女，以

簡單的生活方式，不聲不響的蓋起了醫院，成立了全國性的救災網，把觸角深入到台灣每一個角落，他們不能不說是受到了異常的震撼！

「看到上人為佛教、為眾生不惜捐出生命。而自己呢？是個生意人，以前每天一睜眼，就想賺錢，雖然天生一副強壯的體格，但不知道好好運用，常喝酒應酬，上卡拉OK、舞廳，日夜顛倒，和師父比起來；她一個瘦弱女子卻可以做出這麼多轟轟烈烈的大事，所以我就將感動化為行動，希望能替師父多分擔些煩惱，除了遵守『十戒』，也捐錢、捐土地，只要能減輕師父的負擔，我都願意。」（出於《甘露妙語——我最愛用的一句話》36

頁）
這些男性們不僅認同了慈濟，也開始相信慈濟對台灣所可能代表的無限的希望。他們徹底的改變了自己過去的行為，也心甘情願投入慈濟，這不僅是要為自己過去的行為贖罪，更是要為台灣以後世世代代的子孫「做功德」。

慈濟功德會是以女性生活網絡為主要媒介，開展出來民間集體性的現實社會關懷，它代表了人們在公領域的參與被剝奪以後，經由私領域的擴張所產生的民間自發性社會參與。它經由證嚴法師與人群共同互動後所發展出來，成為具體可行的社會實踐方案，提供民間參與社會的管道，也反映了民間的聲音。隨著社會的快速變遷，其改造社會的方法或視野或許有其時代的侷限性，然而其所呈現出來的無私無我、完全奉獻的大愛，卻是慈濟留給台灣人無限美好而永恆的精神資糧。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博士後研究員）